

一位心理小說家

斯丹達爾

陳梓楠

歐洲文化中心有幾世紀都為法國文化所佔領，而法國文學則是文化中盛開的花朵，然而法國文學也不時地吸收外國文學，像十六世紀法國文學受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十七世紀受西班牙文學的影響，十八世紀英國中等階級精神和功利主義的道德傳到法國作家的作風裏，十九世紀是受德國影響。

自從西元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八九年間，法國的政治陷入極端混亂時期，君主、帝國、民主三個政體時常在更替着。人民的生活如在死亡的邊緣上，痛苦非常。此時期的法國文學，也如政治一樣動盪着，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派別，前期是在浪漫主義的籠罩下，後期則為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所取代，在末了將近二十世紀時，所分出來的派別變得更多更複雜了。當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潮流正滲入民心時，却有一位佼佼者出現，他不和雨果·拉馬丁（浪漫主義領袖）站在同一線上，也不完全依靠巴爾扎克成名，獨自在默默中耕耘着自己的小天地，當時的人們忽略了他的存在，而他也沒有求別人來瞭解自己，連最好的朋友歷史小說家梅易美（Prosper Merimee）都對他的著作感到輕視，他只有用傲骨支持下去，長嘆地說：

「在一八八〇年後，我相信會被別人所了解的」。

目前二十世紀裏他在法國文學史上的確佔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他的著作「紅與黑」與他的名字——斯丹達爾已經傳遍整個地球的每一角落，成為一個衆所皆知的不朽人物了。

一八三〇年斯丹達爾完成一部空前偉大的傑作「紅與黑」，隔一年這本書開始問世，然而這一位有如尼采所說的「超人」却像一顆閃亮發光的鑽石被投入茫茫海洋裏，沒有聲音沒有波紋，沉落在冷淡淡漠中，被十九世紀的人們所忽略了。法國現實小說家福樓拜爾的「巴法利夫人」剛落地時即被人們議論紛紛，甚至被傳進法庭去爭辯，成了當時的名人，現代的「日安、憂鬱」作者莎岡也同樣被捧上文壇來談論，然而斯丹達爾的「紅與黑」被擱在小樓中度着悠閒不為人知的日子，也許斯丹達爾有自知之明，在「紅與黑」的原稿第一頁寫着這麼一句話：

「TO THE HAPPY FEW」（獻給少數的幸福人）天才生不逢其時只有如此自慰了。

斯丹達爾 (Stendhal) 的真實姓名是瑪利·亨利·白爾 (Maître Henri Beyle) 誕生於法國東南部格雷諾市。他是十八世紀觀念論的信徒，反對保皇黨的作風，反對宗教的虛偽。在生活裏他注重的是感覺的滿足，這種感覺的滿足並不是我們今日社會所說的那種尋歡作樂的方式，求一時慾望的滿足而已，是一種帶有精神上沉醉性的解放，有如脫韁野馬奔馳於青草地上似的快樂和自由。他對於當時法國社會流行的墮落性物質享受的追求感到厭煩，指出人性的可悲和生命力量的頹喪，他嘲笑十九世紀道德的偽裝，感情的騙人，他把義大利和西班牙那麼熱烈的愛拿來和法國作比較，總覺得法國的人民是戴着多種的面具，所以他很不客氣的批評當時的傳統作風。

「斯丹達爾」這個名字根據一些權威人士的考證，是從德國的布倫慈維光省的一個市鎮取來的，這個市鎮即是「斯丹達爾」。父親是一位奸詐，脾氣暴躁的人，他恨父親的種種行為，他敬愛着母親，七歲時母親逝世後被外公所收留，外祖父家給斯丹達爾後來的思想和藝術觀念有很大的影響，他說過：「外祖父是十八世紀的哲學觀念，祖母則代表西班牙主義。」

當他在學校時便開始閱讀莎士比亞、盧梭、莫里哀（十七世紀的大喜劇作家，不是目前的「蝴蝶夢」作者德芬，莫里哀）等人的著作，並且在校的優異成績，甚得長輩們的敬重，而他自已知道對學校的功課是多麼不喜歡，他的學問並非得自師長的傳授，而是自修研究得來的。

一八〇〇年斯丹達爾辭掉幹了將近兩年的軍隊職務，開始走上文學的道路，有意創造自己成爲一個名人，可是他以往追求聲名，夢想愛情和劇本創作都沒有成功過。十二年後他又從軍隨着拿破崙的大軍進攻莫斯科，經歷那一場驚心動魄的莫斯科之役。他和年青人一樣，崇拜戰爭，崇拜拿破崙，可是當他看見法軍敗退，士兵沿路上的寒冷、饑餓、死亡時他感慨萬千，他傷心的自吟：

「這是拿破崙的命運，難道有朝一日這也是我自己的命運嗎？」

莫斯科回來後，拿破崙任命他爲國會的審計官，以後接連着有不少的日子，斯丹達爾在官場中得意過。結果養成一種奇異的性格，他善於觀察人的外表和分析人的心理，刺穿人的假面具，處處在顯着「我」的表現，在社交場合裏，他毫無顧忌的批評別人，因此被認爲是不合時代風尚的討厭人物，這種作風和他所著書中描述出來的互相吻合，難怪會被排斥，而埋沒了他自己「紅與黑」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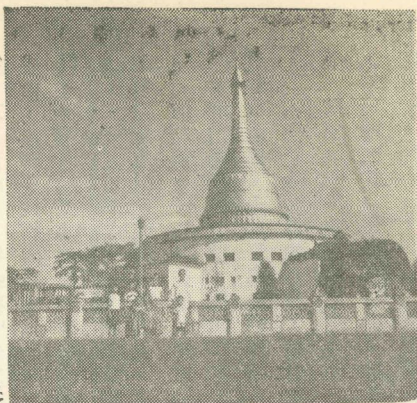
一八三九年第二部巨著「巴姆城的修道院」出版後，才受到少數人的注目，但是「紅與黑」還是沒有機會抬頭，巴爾扎克曾在巴黎評論上發表一篇頌揚他的文章，斯丹達爾只報以輕微的一笑，也許他認爲這種頌揚只是意外而已。過了三年，中風的突發癱瘓使他跌倒在街上，沒有幾日這位十九世紀法國心理小說里程碑的樹立者便閉目逝世了。他把斯丹達爾的名字留給後人來瞻仰，算是痛苦中掙扎出來的唯一可安慰自己的報酬。

浪漫派興起後，小說不久便成了最受歡迎的文學產物，此時期最主要的小說便是歷史小說，代表人物便是雨果、大仲馬等人。到了巴爾扎克手上開始轉變爲注重社會問題的現實小說，不再把事實加以渲染，以真理爲前題，不去選擇和安排自己的意志。斯丹達爾演成了心理小說，分析人物的性格，研究心理。可是他的「紅與黑」和「巴姆城修道院」的兩部不朽名著，却有浪漫主義的色彩，充分地表現着「反抗傳統」和「自我提昇」，又沒有脫離現實的描寫而近乎寫實主義的格調。力的表現和勇氣的強調與浪漫派、寫實派也大不相同，近代法國文學史家郎格對斯丹達爾下定義：「力的研究是斯丹達爾小說的靈魂。」

更有人批評：「巴爾扎克用海洋似的篇幅來製造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法國全面的畫景，他把事實呈獻給人們，讓人們看見了財產、地位、愛情是怎麼地從事於野蠻的鬭爭，以及這種鬭爭的普遍和結果，他運用一種基本的假設來描述人類求成功的慾望和貪婪的狂熱，左拉寫了二十幾部小說企圖描繪出第二帝國時期家庭社會和自然歷史。斯丹達爾做了一個心理和哲學的深刻研究，更把這研究安置在一片重要的歷史背景上。他善於觀察靈魂，把靈魂化成性格，再由性格表現成無數的外表動作，而這些動作形成了社會的相貌。」

斯丹達爾是長在浪漫派的天下裏，而他却没有跟着時代的潮流走，雖然當時康斯當 (Benjamin Constant) 的「阿道爾夫」被推爲心理小說中的傑作，但是他並不是個職業性的小說家，「阿道爾夫」也只是一部散文小說罷了，斯丹達爾的「紅與黑」才顯出他是真正的心理小說，他站得穩，打得住腳。他的成功不是輕易得來的，這種人活得才有價值，如果像「飄」的成名後而作者再也沒有出版過引人注目的書，這樣似乎是比斯丹達爾來得平淡了。

仰光和平塔



緬甸聯邦的首都仰光，是一個多彩多姿的城市，名勝古蹟很多，恢宏瑰麗的佛廟星羅棋佈，大金塔尤為舉世馳名。與大金塔並駕齊驅的是仰光「和平塔」，緬甸名為「疆巴埃」，「疆巴」是巴利語(KAPPY)的轉訛，依照中國的佛學詞語，就是「大千世界」。「埃」是緬語，有安寧、恬靜、和平等涵義，也就是「世界和平」，所以華僑將該塔稱為「和平塔」。這個佛塔的奠基禮於一九五〇年舉行，全部佛塔的建築工程於一九五一年完成，當時的緬甸總理宇汝魯親自前往主持升寶傘典禮。

和平塔塔基的周圍約有三百英尺，塔的高度有一百一十八英尺。塔裡所供奉的一尊遠在中國明朝時即鑄運到緬甸來的大銅佛，是於該塔落成時，由緬甸故都曼德勒的「素麗」佛廟轉運到的。二十年來，緬人一直篤信此佛的法力無邊，善男信女，頂禮膜拜，至今香火猶盛。塔內寶龕的周圍有一百英尺，寶龕的附近有五尊浮雕的佛像，每個八英尺高，尊尊雕得活靈活現，神采奕奕，每尊佛像都面對門口，寶龕的裏面，珍藏着佛弟子目犍連及舍利弗兩人的舍利子。

距和平塔二百英尺有一個優美孤特的石窟，此龐大的建築是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起興建，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十日竣工，全部費用九百一十萬元緬幣，（折合臺幣七千二百八十萬元），在經過一年兩個月零十天的冗長時間與耗用如此龐大的資金，完成這樣雄偉壯麗的建築物，是緬甸空前未有的巨大功德。

石窟的頂尖上及四週佛旗飄揚，其中還有數面靈符高懸，更好玩的是石窟上有一個獨立雕像站立着，由遠處眺望，另有一番景緻。據說當局建築這一座石窟的宗旨，是要保存佛教的傳統，至於石窟的建造形式，亦是佛教的具體化，六根石柱和六個入口門戶正象徵着第六屆佛經修纂大會。在牆壁上開拓的三層洞穴，則代表佛法中的二十四物。該石窟全部是用大小的小石塊堆砌而成，從外表看來是粗糙而不精細，但石窟裏面的裝璜有如宮殿，輝煌奪目，富麗出眾。石窟內的四週，還有鑲着佛經的雲母石碑，這座石窟不但耗費近千萬元，而且還有六萬餘人貢獻勞力。

在和平塔的附近，還有一間佛教大學，一個受戒堂，一個圖書館，一個療養院，四個職員宿舍，一座印書館，一間食堂，全部費用耗緬幣五千萬元，這是緬甸獨立以後最偉大的建築物。

子

求